

# 新儒学三大家的比较

——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

李素萍, 黄秋生

(西南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31; 南华大学 社科部, 湖南 衡阳 421001)

**摘要:** 现代新儒家的群体当中, 作为现代新儒家代表的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 在有着某些共识的同时, 还对儒学有着独具慧眼的个性理解和阐述。

**关键词:** 新儒学; 共性; 个性

**中图分类号:** B2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7387(2007)01-0074-03

近现代, 随着西方列强的殖民掠夺和文化的西学东渐, 中国出现了历史上第二次自发的百家争鸣。新儒学便是发端于此的东方意识流派。于是, 人们在这一社会动荡、变化叠起的近现代史上发现了第一个真正“生命化了孔子, 使吾人可以孔子的真实生命及智慧相照”的梁漱溟; 发现了为现代儒学复兴“奠其基, 造其模, 使后事者可以接得上, 继之而前进”的熊十力; 发现了对宋明理学“照着说”转而“接着说”的冯友兰。虽然, 在中国社会历史盛行的非对即错的裁断中, 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三位现代新儒家遭受了五四主流知识分子的激烈批判, 但是, 他们从未放弃苦苦追溯民族文化灵根以重建东方文明的信念, 他们一直为儒学走向新生而奋斗不止。正是由于以他们为典范的新儒家们的努力, 使得现代中国出现了现代新儒学同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一道三足鼎立的局面。笔者在此想把梁、熊、冯三位现代新儒家作一个简单的比较, 借以窥探中国传统文化中值得继承和发扬的部分精华。

## 一、三位新儒家的简介

人们常说相同的遭遇能产生内心的共鸣, 不同的经历引起对人生的不同的感悟。梁、熊、冯三位新儒家处于同一时代, 但又有着不同的生活经历。

梁漱溟(1893—1988), 名焕鼎, 字寿铭, 后改为漱溟。生于北京, 祖籍广西桂林。1911年毕业于北京顺天中学堂, 受过新式教育, 倾向西洋思想, 赞成辛亥革命, 并参加过同盟会。1913年转入佛家生活。1916年发表了《穷元决疑论》。1917年应蔡元培之聘到

北大讲学。1920年由佛学转向儒家, 该年8月在山东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讲演。1924年辞去北大教职, 从事乡村建设运动, 解放后任政协委员。代表作有《穷元决疑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等。

熊十力(1885—1968), 原名继智, 字子真, 晚年号漆园老人。湖北黄冈县人。家境贫困, 少年随父学习。父亲去世后基本上靠自学。曾秘密进行反清活动。1917年参加护法运动, 失败后转向学术救国。1920年在南京支那内学院随欧阳竟无学习佛法。1922年应聘到北大任教, 主讲唯识学, 后由佛转向儒。抗日时期在四川讲学, 解放后仍致力于学术研究。代表作有:《新唯识论》、《十力语要》、《原儒》、《体用论》、《明心篇》、《乾坤衍》等。

冯友兰(1895—1990), 字芝生, 河南唐河县人, 1910年考入开封中州公学。1912年进入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预科班。1915年考入北大中国哲学门。1919年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哲学系, 后获博士学位回国。1923年后分别在中州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先后任教。解放后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代表作包括“三史六书”。即:《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等。

可见, 三位大师同处于动荡变化的中国近现代, 同处于东方文化遭受西方文化强烈冲击时代, 但由于他们的家庭出身、经历等原因的影响, 又走着独具个性的人生之路。

## 二、三位新儒家的共性

作为现代新儒学的代表, 梁、熊、冯都强调继承发扬儒学, 视

收稿日期: 2006-07-10

作者简介: 李素萍(1948—), 女, 四川成都人, 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硕士生导师;

黄秋生(1973—), 男, 湖南衡阳人, 南华大学社科部讲师, 硕士研究生。

儒学为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并以它为主体,吸收、接受和改造西方文化,而去寻求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现实出路。

共性之一:以儒为宗,即三大家都以儒学作为思想源泉来构筑自己的体系。

梁漱溟认为,在西方文化的侵袭下,在完全排斥中国文化浪潮下,中国文化有连根拔掉的危险。为使中国文化不中断,他决计以复兴儒学为己任,希望以儒学中有价值的思想来救治西方文明中的精神危机。于是,他以儒为宗,融合西方生命哲学和《周易》生生之理,建立起自己的哲学系统。在他踏入北大校门之时,便明确来意——除替释迦孔子去发挥外更不作旁的事。在梁看来,那种视清代学术为中国文艺复兴的说法是错误的,因为清代学术根本没有人生态度的复兴。也在人视五四为中国的文艺复兴,他认为这更为荒谬。因为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只是西洋文化在中国的兴起,根本算不上中国的文艺复兴。他提出:要复兴中国文化,必须重开宋明儒者所倡导的讲学之风。

熊十力在梁漱溟复兴儒学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提出了儒学救世论。他说:“今日人类,渐入自毁之途。此为科学文明一意向外追逐不知反本求己、不知自适天性所必由之结果。吾人意欲救人类,非倡明东方学术不可。”<sup>[4]</sup>他还说:“古者儒学政治理想;本为极高尚之自由主义,以个人之尊严为基础而互相协和,以成群体。期于天下之人人各得自主,而亦互相联属也。各得自治,而亦互相比辅也。春秋太平之旨在此。”<sup>[5]</sup>由此,熊十力对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的推崇可见一斑。

冯友兰也自觉地以儒学为自己的直接先驱,声明自己的新理学是“照着”转而“接着”程朱理学讲的,实质就是对程朱理学的继承和发展。他的“未有飞机先有飞机之理”就是朱熹“未有这事先有这理”的翻版;他的新理学和程朱理学都号称是关于宇宙人生根本道路的学说,都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明内圣外王之道”,都是要使人胆确超凡入圣的门径,都在天人合一的基础上,以“天道——人道”这一逻辑而展开的关于人的哲学。可见,冯友兰和梁漱溟、熊十力一样都是以儒为宗来构筑自己的体系。

共性之二:以德为心,即三大家都是认为道德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中国文化的中心。

在梁漱溟的眼中,西方是以宗教为中心的文化系统,而中国文化是以周孔之教为中心的文化系统,即中国文化是以道德代替宗教。他所倡导的儒学复兴实质上就是人生态度的复兴,是儒家伦理道德的复兴,因此他极力美化孔子的伦理道德思想。他认为孔子所讲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能使家庭社会调和相济,处处都能得到一种情趣而不是冷漠。他甚至预言,今后的世界要废除法律用孔子的伦理道德来代替。他说:“我虽不敢说以后就整盘的把孔子的礼乐搬出来用,却大体旨趣就是那个样子,你想避开也不成的。”<sup>[6]</sup>

熊十力从哲学本体论的角度论证道德的优先原则,即道德的第一原理。他的心性本体论是以道德为入路渗透到宇宙本体。他的哲学就是道德的形而上。他说:“盖东方哲人一向用功于内,涤尽杂染发挥自性之用。其所谓体认,是真积力久,后脱然离系,本体呈

露时,乃自明自见。”<sup>[6]</sup>又说:“尽心之尽,谓个人修为工夫,当对治习染或私欲,而使本心得显发其德用无一毫亏欠也。”<sup>[6]</sup>可见,他将传统儒家中所突出的内圣极致的孔颜乐处给予了本体论的新论证。由宋明理学的伦理道德和人生观推演出宇宙观和本体论。

冯友兰认为人类组织之理没有新旧,道德也没有新旧。他说:“我们是提倡所谓现代化底,但在基本道德这一方面是无所谓现代化底。”<sup>[6]</sup>正因为“基本道德则是不可变化”,所以“在道德方面是继往”。他在《新原道》一书中最后写道:“新理学是最玄虚底哲学,但它所讲底,还是‘内圣外王之道’,而且是‘内圣外王之道’的最精纯要素。”<sup>[7]</sup>冯友兰仍然是对儒学的“道德文化之本,生命价值之源”的继承和发展,他的天地境界是道德境界的继承和超越,是最高最佳的道德境界。

共性之三:以生命为本,即三大家都高扬生命讴歌心灵,突显人在宇宙的主体地位。

梁漱溟将生命视为宇宙的本质,他指出:宇宙是一大生命,了解了生命就了解了宇宙。虽然到处是生命之所表著,可是有一个地方宇宙大生命的核心,这个核心就是“人”。生命是活的,宇宙最活的就是人心。果能体认人心,就能体认出宇宙的生命来了。在他看来,自然界中能体现宇宙大生命的精神是生物,因为自然界现存的物类都陷入了本能的生命,只有人类的生命,扬生命本性奋进不已已是宇宙的本质特征。

熊十力更加突出生命的意义。他认为生命、心灵由无机物、植物、动物、人一步步冲破物质的闭塞而显露出来,而人的本心是宇宙生命发展的最高形态。熊十分极度高扬人的尊严与价值,强调人在宇宙中的核心地位,揭示人生的内在意义,在他的心物合二中,心是主施,物是主受,心能主导物质,改造物质,宇宙实体就是世人的本心,本心决非外在,所以不必向外探索宇宙本体,反求自证就可以体悟到宇宙万物的本体。

冯友兰称哲学是入圣域之学,是叫入做圣人的学问,他指出:哲学的目的在于确定理想人生以成为人们在宇宙间应该用来作为参照的标准,所以应对宇宙间一切事物以及人生一切问题作比较深入的研究。他说:“假使我们只用一句话说出哲学是甚么,我们就可以说:‘哲学是对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sup>[8]</sup>基于对哲学的这种理解,人生问题也就成了他的新理学的中心问题。也正是如此,他的境界说被认为是在深刻领悟中国传统人生哲学的真谛的基础上,借鉴西方伦理学思想创造出来的一种独具风格的现代人生哲学。

### 三、三位新儒家的个性

三位现代新儒家以儒为宗,以德为心,以人生为本的共性表着他们光扬儒学的目标,但是,他们对传统儒学和西方文化有着独具慧眼的认识和吸引,从而形成各自特色的个性。

个性之一:具体师承不同。

梁漱溟师承孔学,他对孔子的敬重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说:“孔子以前的中国文化差不多都在孔子手里,孔子以后

的中国文化又都由孔子那里出来。”在他眼里，中国文化就是孔家文化，复兴中国文化就是复兴孔家文化，所谓世界文化走第二路向就是走孔子路向。他的责任和使命就是要领中国人，甚至全世界人的走孔子的路。他还说：“宋学虽不必为孔学，然我们总可以说，宋人对孔家的人生确是想法去寻的，他们对孔子的人生生活，还颇能寻得出几分呢！”<sup>[9]</sup>由此可见，他对宋明理学的赞赏都是基于宋明理学和对孔学的继承和发展。

熊十力对易学的推崇完全可以和梁漱溟对孔学的敬重相媲美，熊读易、习易、研究易，乃至以易为核心建立起自己的哲学体系。在他看来，中国最古的哲学典册，莫如《大易》。并一再声明，《新唯识论》是准大易而作，只是形式上不同而已。他认为易学是儒学的根底，回归大易就是回归儒家，阐发大易就是阐发儒家。他的“翕辟成变”的辩证思想实际上是《大易》中包括的中国古代相辅相成的矛盾法则的克隆。可以说，大易是他的思想根本，也是他的思想的注脚。

冯友兰则在《新理学》的绪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新理学所讲的系统，大体上是承接宋明道学中之理学一派。程朱理学是冯友兰的新理学的直接继承对象。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接着程朱理学来讲”。新理学继承了程朱理学的“理在事先”的客观唯心主义立场，继承了程朱理学的基本思想和基本格局。虽然，冯友兰也吸收道家、西方新实在论、逻辑实证论等思想，但其思想的基本概念、基本核心和主要内容都是对程朱理学的继承和发扬。正因如此，冯友兰给自己的哲学体系命名为“新理学”。

个性之二：思想路线不同。

梁漱溟从文化立论来讲哲学。他指出：文化就是一个民族的生活样法，而生活就是没有尽的意欲以这种意欲的不断满足和不满足罢了。接着，他又以这种意欲为轴心比较中西印三大文化的特征。可见，梁漱溟把文化归因为生活路向和人生态度，又把生活和人生归因于意欲的不同精神而建立起自己的文化哲学，然后又从文化哲学入手通过比较中西印三大文化系统的优劣得失，分析人们的心理需要和人生期向，形成自己的哲学系统，同时又证明了儒学具有光明的前途。

熊十力则从纯粹的形而上入手，建立起精深的哲学体系。他认为本体是“万理之原，万德之端，万化之始”，是一切存在的始基和根据，因而哲学以本论为其领域。在熊十力看来，哲学就是本体论，离开了本体论的立场，即等于离开了哲学的立场，也就把哲学混同于具体的科学门类。他不仅激烈地反对哲学实证化的倾向，而且严厉地抨击近代以来的认识论为主体的西方哲学，认为它不是哲学的正宗，只是“在知识上钻来钻去”。宇宙本体是熊十力哲学开步发始的立足点，也是他哲学追求论证的最终目标。

与梁漱溟、熊十力不同，冯友兰以其现代西方哲学方法论和逻辑学，通过严谨的逐步推理，构造出一个纯逻辑的理论体系——新理学。可以说，就思想路线来看，冯友兰的新理学实质上是注重逻辑分析的理性主义。在冯友兰眼中，借助经验了解真理，并不是肯定真理源于经验，真理之为真理是由理性决定的，而不是由经验证实的。正是这种理性主义倾向，使他注重逻辑分

析，在分析中把事物的共性和个性相区别开来，把人们认识事物的感性活动和理性活动区别开来。

个性之三：哲学体系各具特质。

中国儒家哲学、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和佛教唯识学交融而成梁漱溟的哲学体系。这一哲学体系的最大特质在于对直觉的登峰造极的崇尚。梁漱溟对感觉与理智的认识功能加以贬抑，把直觉看成体认“生命”本体的唯一途径。他说：“譬如我们听见声音觉得甚妙，看见绘画觉得甚美，吃糖觉得好吃，所有妙、美、好吃等意味着都由人的直觉所妄添。”<sup>[10]</sup>最后，他竟以直觉去诠释孔子的仁。依梁漱溟，仁就是敏锐的直觉，直觉敏锐就是仁，直觉迟钝就是不仁，孔子教人求仁，其实就是求这种敏锐的直觉。

“体用不二，即用显体”是熊十力建立在儒学、佛学和某些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片断的基础之上的哲学体系的精髓。熊十力所说的“体”指宇宙本体，“用”指本体的功用或表现。在他看来，“用是体的显现，体就是用的体，无体即无用，离用无本体。”<sup>[11]</sup>也就是说，“体”和“用”是相对而言，没有无用之体，也不存在无体之用。同时，他又指出“体用不仁，源在体。”“体”是一切存有赖以存在和演化的根据。他在《新唯识论》中这样写道：“本体以体用不二为宗。本原、现象不许离而为二。真实、变异不许离而为二，绝对、相对不许离而为二，质、力不许离而为二、天、人不许离而为二。”<sup>[12]</sup>综上所述，“体用不二”是熊十力哲学体系的根本和特色。

冯友兰以逻辑为本体论建构强调理性和理性的“理世界”。与梁漱溟强调“情感直觉”恰好相反，冯友兰重视逻辑分析；与熊十力强调“体用不二”恰好相反，冯友兰强调理世界的主宰性。冯友兰所指的“理”没有任何物质规定性，既不是指事物所具有的客观规律，也不是物质或精神所谓的纯存在，而是一种脱离了物质及其规律的抽象。他说：“说理是主宰者，即是说，理为事物必须依照之而不可逃。其理为某事物所必依照而不可逃，不依照某理者，不能成为事物，不依照任何理者，不但不能成为任何事物，而且不能成为事物，简直是不成东西。”<sup>[13]</sup>可见，冯友兰认为事物是由理而派生，事物之所以存在全仰仗理。

总之，中国近现代，在西方文化的侵袭之下，统治了中国几千年的主流意识的儒学风雨飘摇，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三位现代新儒家挺身而出，为儒学作情感拥护和为西化作本能回应，既形成了共性，又造就了各自个性。撇开评价其思想体系的对与错，仅从他们对民族精神的捍卫和对西方有价值东西的吸收而言，就值后人学习和推崇。

参考文献：

- [1][2]《十力语要》卷二，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第288、75页。
- [3][9][10]《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第196、148、73页。
- [4][5]《新唯识论》，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第679页。
- [6]《新事论》，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第228页。
- [7][8]《三松堂全集》第5卷，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第160、165页。
- [11][12]《体用篇》，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第336、6页。
- [13]《新理学》，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第335页。